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1)

劉道玉



十、接受再教育

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方針，再加上林彪、江青一夥野心家、陰謀家的破壞，使得全國黨政機關和各行各業處於癱瘓和半癱瘓之中。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怎樣才能醫治創傷呢？毛澤東再次想到了軍隊，於是決定派人民解放軍執行三支（支左、支工、支農）兩軍（軍管、軍訓）任務。

1968年11月18日，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浩浩蕩蕩地開進了武漢大學，對學校進行全面接管和領導，這是廣大師生員工久已期盼的一天。這意味著無政府主義狀態將要結束，在正確方向指導下的鬥批改也行將開始。



武漢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軍宣隊），是由武漢空軍司令部為主的各軍事單位的軍官和武漢鋼鐵公司為主的各有關工廠有經驗的老工人組成的，指揮長叫武繼元，是武空的一位將軍，他有水平、有能力、有魄力，深受廣大師生敬佩。湖北省革命委員會于1968年2月成立，工軍宣隊進校後，武漢大學又成了新成立的省革委會的試點單位。

工軍宣隊進校後，面臨的任務十分艱巨，首先是組織全校師生員工學習毛澤東“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關於實現革命大聯合”、“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和知識份子必須“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等一系列的講話。通過學習和細緻的思想工作，逐步增強了黨性、克服了派性，收繳了槍支彈藥、制止了武鬥，促進了革命大聯合，建立了院系各級革命委員會，為下一步清理階級隊伍和進行教育革命奠定了基礎。



工人解放軍宣傳隊進校

1969年3月，化學系的工軍宣隊決定抽調少數教師和學生組成一個教育革命小分隊，奔赴當時武漢最大的化工廠——葛店化工廠，一方面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另一方面進行調查，為教學改革摸索經驗。這個小分隊由14人組成，其中8個教師，6個五年級的學生，隊長是一個青年教師，副隊長是一個學生。我們被分配到兩個車間，我和另一個講師以及兩個學生被分配在三連（六六六殺蟲劑車間）；分配在一連（電解車間）的是隊長，一位老教授和4個學生。從專業上劃分，電解車間是屬於無機化學，而六六六殺蟲劑車間是屬於有機化學的，我們4個教師是按照專業對口分配的，這樣有利於理論聯繫實際。

在頭3個月內，我們完全與工人們實行三同，同吃不成問題，大家都在食堂吃“大鍋飯”；同住不可能，因為已成家的工人住在面積十分狹小的家裡，不可能有我們容身之地；同勞動絕對沒有問題，我們完全跟班勞動，白天、夜班輪流上。自上大學到畢業後的十多年，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生產線，學到了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深感理論脫離實際的弊端。過去，我們學習化學只是從書本到書本，對化學的理解多是停留在化學符號和反應式上，一個化學符號的實體是什麼，一個化學反應如何發生並向著有利方向發展，在腦子裡完全是抽象的。通過生產實踐，我方瞭解到書本的化學應，甚至實驗室中的化學反應，與工業生產條件下的反應，是有很大差別的。我初步體會到，知識份子到工廠參加生產勞動確有必要，不僅可以學習工人師傅們的優秀思想品質，豐富的生產實踐知識與技能，而且有利於教學聯繫實際，特別是對於科研成果向生產轉化是極有好處的。

“六六六”殺蟲劑是最老的一種農藥品種，儘管由於它嚴重污染環境，對人畜毒性大，現在全世界已禁止生產和使用，但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它還是我國農業的當家農藥。當時，葛化的“六六六”車間是全廠生產技術最落後、生產條件最差的單位，不僅勞動強度大，而且燃燒、爆炸、中毒事故不斷發生，嚴重地影響著工人們的健康。在這樣



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第3排左4為劉道玉）

惡劣條件下鍛煉，是害怕困難，還是面對困難並去戰勝困難呢？對我們的確是一次考驗。但是，我們畢竟是臨時性的，咬咬牙也就過去了，然而廠裡的工人們長年累月在這樣的環境下勞動，怎麼能受得了呢？我心想，我們下到工廠接受再教育，跟班勞動，這些肯定是必要的，但是從生產實踐中發現問題，開展科學研究和技術革新，改善工人師傅的生產條件，這也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職責。

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與我在同一車間接受再教育的同事，不，嚴格地說，他是我的老師，無論是他的學歷或學術水準，都要高於我。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並具體提出了“‘六六六’生產管道化”的建議。在60年代，國際上出現了化學工業生產管道化的革新熱潮，它的優點是以流動床代替固定床，以連續法代替間歇法，不僅可減輕勞動強度，而且還可以大大提高產品的生產率。我們把這個想法向車間和廠領導作了匯報，他們表示支持，並撥了一筆技術革新的經費。於是，很快成立了“三結合”（幹部、技術人員和工人）的技術革新小組，開始了技術革新攻關。我們首先從

158 調查研究入手，查閱了國內外的文獻資料，參觀了武漢天一印染廠、國棉一廠等單位，然後自己購買器材，自己動手加工反應器，從小量開始逐步進行擴大試驗。經過6個多月的努力，從無數次的失敗中總結了經驗與教訓，我們最終獲得了成功。我們技術革新的成果，既獲得了工廠領導的肯定，也受到了學校工軍宣隊領導的表揚，他們說：“你們不是以‘勞動省心’的消極態度到工廠接受再教育，而是想工人之所想，急工人之所急，從生產實踐中提出問題，用‘三結合’的辦法開展技術革新，減輕了工人們的勞動，提高了生產效率，這才是過硬的思想鍛煉，也才是知識份子與工人相結合的正確道路。”

技術革新的成功，與工人師傅們融洽的關係，使我感到從來沒有過的開心，決心沿著與工人相結合的道路繼續走下去。但是，1970年3月，也就是我到葛店化工廠勞動鍛煉整整一年以後，學校工軍宣隊指揮部決定調我回學校工作，任命我為校教改組理科組組長。據說，這一調動還是當時任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原省長張體學同志表態的結果，他說：“劉道玉是個好同志嘛，他反修立場堅定，還會有什麼問題呀，據說現在還放在工廠勞動，為什麼不安排使用？”工軍宣隊的這次調動和安排，不僅結束了我在工廠的勞動鍛煉生活，而且還意味著我這個“走資派”在政治上被“解放”了。說心裡話，對於這個安排我心裡很矛盾，一方面我很感謝工軍宣隊對我的信任，特別是張體學同志的關心；但另一方面，當幹部或叫做官我壓根兒不願意。但是，那時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知識份子還是屬於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如果我不服從決定，就有可能被扣上不服從工人階級領導的大帽子。於是，我違心地同意了，誰知邁出的這一步，竟使我長期陷於政治泥潭而不能自拔，從事了我雖不願意但良心又驅使我不得不去認真拼搏的事業。

我到教改組後，承擔的第一項工作是參加寫作小組，撰寫“堅持教學、科研、生產勞動三結合，創建嶄新的教育新體制”一文，我是主要執筆人。這篇文章是準備帶到5月



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交流的。那次會總共開了108天，是個典型的“馬拉松”會議，同時也說明，教育問題非常複雜，爭論的問題也是十分尖銳的。在周總理的主持下，會議形成了一個“紀要”，毛澤東對“紀要”作了圈閱。“紀要”錯誤地認定，解放後17年教育戰線基本上是修正主義路線占統治地位，17年培養的知識份子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通常簡稱為“兩個基本估計”的左傾路線，提出了“同17年對著幹”的口號，也就是說，凡是17年的做法都要批判和否定。那時，不管是自覺或不自覺，對“兩個基本估計”我也是接受的，因為毛澤東說了要“打破知識份子獨霸的一統天下，佔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

1970年秋，繼北大、清華之後，武漢大學也開始招收工農兵大學生，是全國最先恢復招生和教學的學校之一。遲群在北大、清華炮製的從工農兵中招生的方針是“自願報名，基層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簡稱“十六字”方針。武漢大學緊跟兩校，當年也從工農兵中招收了近千名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年齡相差懸殊的大學生。他們一進校門，就提出了“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的響亮口號，開創了“工農兵一統天下”的時代。

隨著招生的恢復，教改也日益深入到教學領域，這對於像我這樣的知識份子，思想是否改造好了，這又是我面臨的新考驗。是站在科學真理一邊或是站在工軍宣隊一邊，是講真話或是說假話，我必須作出選擇，不可能有調和的餘地。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大概也是如此。工軍宣隊“解放”了我，對我的確不薄，對此我是感激的，但我不能以感情代替原則。

當時，在許多大政方針政策上，我是緊跟工軍宣隊的，但在一些教育理念、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上，往往又和工軍宣隊領導的意見相左，以致發生了爭辯。例如，有的工軍宣隊領導說，要辦滅火劑、靈芝草專業；我說不行，那只是一

160 個產品，不能成為一個專業。他們說，要以典型產品帶動教學；我說可以結合典型產品進行教學，但帶動不了教學，更不能代替教學的全部內容。他們說，要火燒“三層樓”（意指由基礎課到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的三個教學層次）；我說“三層樓”是從長期教學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是符合教學規律的，應當得到尊重。更大和最激烈的爭論，是關於歷時十年建成的化學大樓的分配使用問題。工軍宣隊領導決定：對化學大樓的使用，必須統一規劃，面向全校，按需分配。當我聽到這個決定，感到十分驚訝，如果不加以勸阻，必將造成巨大的浪費。於是，我鼓起了勇氣，直接向工軍宣隊的主要負責人彙報說：“化學大樓只適合化學系使用，因為原設計時是根據每個專業和每個實驗室的專門需要建造的，還配備了專用的水、電、暖和煤氣管線，安排了通風排毒和排汙系統，如果分配給其他系使用，不僅化學系的用房無著，而且還會造成極大的浪費。”那位負責人一聽到我說是按原設計建造時，他就火了，並批評我說：“17年是修正主義路線，原設計方案必須否定，舊的條條框框一定要打破，你的意見沒有考慮的必要。”在連續發生了這些爭辯以後，我引起了工軍宣隊的一些領導人的不悅，在他們看來，我這個人老是愛唱對臺戲，總是代表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說話，已經成了教育革命的阻力。於是，他們一方面在會議上點名批判我，限制我的職權；另一方面又準備把我們全家下放到沙洋分校（原沙洋勞改農場），並永遠不得回總校。僥倖的是，在工軍宣隊領導內部意見並不一致，革委會副主任紀輝同志也不同意這種做法，所以我又被留在教改組工作。但是，我真正發揮作用還是在批判林彪極左路線以後，這時我感到多年以來未有的舒心，似乎是時來運轉了。

1973年7月，我被任命為中共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

1973年9月，我被選為出席中國共產黨全國第十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1974年1月，我被選為中共湖北省第三屆委員會的委員。



第五章 撥亂反正當為先

1976年10月6日，離蘇聯十月革命勝利紀念日只差一個月零一天，就在這一天，在中國歷史上，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事件，中國高層根據人民的意志，一舉粉碎了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因此中國的老百姓把這一天稱為中國偉大的“十月革命”。這標誌著歷時十年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一場衝破“左”傾錯誤的束縛，端正思想路線，實行撥亂反正，推動各項事業改革的新的任務擺到了全國人民的面前。

教育是遭受“文化大革命”破壞的重災區。面對這種形勢，我以“借用”的名義，被調到了教育部，開始了為期兩年的“臨時工”生涯。其間，我懷著對“四人幫”的義憤，以一個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先後主持召開了24個全國性的撥亂反正會議，制定了許多重要文件，對我國高等教育的恢復與發展，進而對它的改革，均起到了重要的戰略作用。身體上的人不敷出，持久的緊張和頑強的拼搏，使我疾病纏身。病魔和誣告好像是兩根魔杖要把我擊倒，但我挺過來了。

兩年的臨時工，在我的一生中是短暫的，但是留給我許多的回憶。



工宣隊帶隊到湖南參觀農民運動講習所

(後排右1為劉道玉)

一、教育部的“臨時工”

粉碎“四人幫”以後，1977年4月初，我在武漢大學襄陽分校蹲點，和分校黨委一起開展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並清查同“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學校黨委書記紀輝同志的電話，要我立即返回總校，說有要事商量。回校後，他對我說：“接教育部的通知，要借調你去參加籌備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時間多長，沒有說明。”聽後，我有些猶豫地問道：“是不是真的借調，我不去是否可以？”紀輝是一位元組織原則性很強的老同志，他有些為難地勸道：“是呀，我也不想你走，學校工作也離不開你。但是，局部要服從全域，下級要服從上級，不去看來是不行的，再說，你去了以後對學校的工作也有好處，我看你還是去吧。”我說：“那就先去看看再說，等籌備工作完成了，我還是要回來的。”他說：“那當然。”

就這樣，4月15日，我到教育部報到。我被安排在辦公大樓二樓的一間辦公室裡住了下來，室內有一張3尺寬的木板床和一套臥具，一個辦公桌，一套普通雙人沙發，一個櫥櫃，一個書架，一個洗臉架和面盆，兩個熱水瓶。這就是全部的家當，這既是我的辦公室、會客室，也是我的寢室，我的兩年“臨時工”生涯就是在這裡度過的。

大約一個多月以後，我突然被任命為教育部黨組成員、高等教育司司長。對此，我毫無思想準備，事前沒有人徵求我的意見，也無人給我打招呼。我的思想鬥爭很激烈，大呼上了“借調”的當，也很後悔，不該到北京來的。與我同時任命的還有副部長劉仲候，他原是江蘇省鹽城地委書記，他分管政工；另一位叫晉桂香，被任命為專職黨組成員，她原是河北省的一位優秀小學教師，曾獲全國優秀教師的稱號。看得出，這次幹部的任命，似乎是中組部有意要對受“四人幫”破壞嚴重的教育部“摻沙子”，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們就成了“沙子”了。



跟常人的心態不一樣，對於中組部的任命，我沒有絲毫喜悅之情，而是愁容滿面。其原因是，我仍然還是在做著當諾貝爾式發明家的夢，同時，我也受到古人的影響，認為京官難當，我曾暗下決心：一不進京，二不做京官，三不做高官。

在任命的最初幾天裡，我坐臥不寧，茶飯無心，總是還抱著幻想，希望說服領導收回成命。首先，我找到劉西堯部長，向他匯報說：“我是在基層搞學術研究工作的，既不適應政府機關工作，又不適應北方氣候，希望解除對我的任命，放我回武漢大學工作。”他說：“你的任命是中組部決定的，任命是不能改變的，回武漢也是不可能的，服從組織決定是無條件的。”看著劉西堯那死板而又嚴肅的面孔，聽了他那教條式的表態，我感到很失望。但是，我仍不甘心，於是我又直接找到頒發任命檔的中組部幹部局，接待我的是張長庚局長。我彙報說：“我一直在基層搞業務工作，沒有經過實際工作鍛煉，不適宜擔任所委任的職務，再說，我很想從事學術研究，這也是黨和國家需要的。”另外，我還談到了我的組織關係、工作關係和戶口仍留在武漢大學，妻子也不願到北京工作，從長遠看這個矛盾是很難解決的。張長庚局長耐心地聽完了我的申述，他並沒有給我戴“必須絕對服從”的政治大帽子，而是和顏悅色地給我講形勢，擺道理。他說：“粉碎‘四人幫’後形勢大好，但是教育是重災區，撥亂反正的任務十分艱巨，要治理需要內行的人。你在大學工作過，瞭解基層情況，最有發言權，政府機關正需要你這樣的人，希望你克服困難，勇敢地把擔子挑起來。今後，在工作中有什麼困難和要求，可以隨時告訴我們，在可能的情況下，我將盡力予以解決。至於組織和工作關係不在北京，這並不影響對你的任命，等你思想通了，儘快把各種關係和全家遷移到北京來。”話說到這個地步，雖然他沒鬆口我回學校，但講話人情人理，也頗有人情味。面對這種局面，我又能怎麼辦呢，只能退而求其次，等待時機再說，同時我也不得不認認真真地幹起了“臨時工”。我之所以

164 把這一段工作經歷稱作“臨時工”，決非嘩眾取寵，而是真實情況的反映。在兩年裡，我既沒有在教育部領取一分錢的工資，也沒有享受到教育部福利。我明知司長的工資要高出講師的工資許多，再加上北京的工資地區差比武漢高三檔，但我寧願在武漢拿低工資而在北京吃高供給。儘管教育部人事司催我調家屬和轉戶口，總務司也要按照我的任職給我分配住房，但是都被我謝絕了，



劉道玉在韶山毛澤東故居留影

我寧願住在辦公室過著寂寞的單身生活。這一切均表明，我不願做官，沒有作長期打算，一旦“臨時工”的“合同”期滿，或者時機一到，我將義無反顧地回到學校。

儘管我不願在教育部任職，也一直沒有打消過“臨時工”的念頭，但在工作上卻沒有任何“臨時工”的思想表現。我生就的性格是：堂堂正正地做人，老老實實地做事。你可以不喜歡那個人，但你要學會與他合作共事。你可以不喜歡那件工作，但你一旦承諾了它，那你就不能馬馬虎虎地對待它，而應竭盡全力把它做好，這是一個人的良知，也是做人的原則。我恪守了這一條原則。

那時，教育部黨組成員9人，正副部長6人，除我以外，其他人都沒接觸過大學裡的工作。因此，凡是涉及到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一律壓到了我的肩上。在撥亂反正期間，可以說是百廢待興，工作常繁忙。擺在我面前的是三多：黨組會議多、文件多、基層上訪要求落實政策的多。為了完成這些任務，我白天開會，接待來訪者，外出調查研究；晚上閱覽檔，起草檔。我每天大約工作16個小時，有時是通宵達旦。



雖然我是教育部裡的一名“臨時工”，但是我的工作卻獲得了普遍的認可，以至於在我離開教育部3年以後的1982年，在教育部部長換屆的民意測驗中，我獲得了名列第一的選票。當然，我不可能當部長，即使獲得百分之百的群眾的擁護，那也是無濟於事的。除了我上面提到的“三不主義”以外，更主要的原因還在於我不僅是一個“臨時工”，而且還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單幹戶。話又說回來，即使要我當的話，我肯定還是會作出“不”的回答。

二、鄧小平召開歷史性的座談會

在“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同志幾起幾落，粉碎“四人幫”以後，他再一次復出了。

1977年8月2日，鄧小平在北京召開了科教座談會，這是他複出以後第一次公開參加的重要活動。因此，這次座談會，無論是對於鄧小平本人還是對於災難深重的科學和教育戰線來說，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部所屬大學，各挑選15名科學家參加會議。會議於8月2日至5日，在人民大會堂四川廳舉行，會議代表們住在北京飯店。參加會議的科學院系統的科學家有錢三強、張文裕、王大衍、柳大綱、林蘭英、彭恒武、鄒承魯等；教育系統有周培源、張光鬥、楊石先、蘇步青、唐敖慶、史紹熙等。此外，方毅副總理，科學院負責人李昌等，教育部部長劉西堯、副部長雍文濤等也自始至終參加了座談會。科學院的吳明瑜和我，分別代表科學院和教育部組成了會議的秘書組，負責會議的記錄、簡報和會議代表的生活問題。



會議是在鄧小平的親自主持下進行的，他首先向前來參加會議的代表表示歡迎。他說：“科學和教育是‘四人幫’破壞的重災區，你們各位恐怕也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打倒了，吃盡了苦頭。這樣的會十年沒有召開了，如果不是打倒‘四人幫’，我們也不可能坐到一起來。現在，中央要我抓一下科學和教育工作，怎麼抓？我請你們來座談，就是請你們出主意，談一談科教戰線上的撥亂反正怎麼搞。希望各位解放思、想，暢所欲言，用不著再擔心‘四人幫’打棍子和戴帽子了。”

在鄧小平的親自倡導下，會議的確開得生動活潑，真正出現了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的大好局面。與會代表大多是我國科教界的泰斗，在“文化大革命”中首馮其沖受到批判，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但是，他們不計較個人恩怨，仍然心系國家的千秋大業，其情十分令人感動。與會代表的發言，有破有立，破就是對“四人幫”破壞教育、科學事業的批判，立就是對科學、教育撥亂反正的建議。這次座談別開生面，好像是一次現場辦公會，有議有決，解決了許多被認為是老大難的問題。這次會議是撥亂反正的良好的開端，也為下一步科學和教育戰線的治理整頓樹立了榜樣。圍繞著科學問題，與會代表提出了許多積極建議，南開大學前校長、著名化學家楊石先，首先批判了科教組在“文革”中所幹的大量壞事。他說：“遲群是‘四人幫’的一員幹將，他通過控制科教組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特別是他們控制的‘梁效’寫作組，製造了大量的反革命輿論，流毒很廣，必須徹底揭發批判，禍根不剷除，撥亂反正就不可能徹底。”與此同時，他還大聲疾呼要恢復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簡稱國家科委）。他說：“以科教組代替國家科委是錯誤的，這麼大一個國家沒有國家科委怎麼行？我們應該充分肯定國家科委17年的路線是正確的，我國1956年制定的科學技術發展方針也應當肯定。當務之急是，必須立即恢復國家科委，歸還被侵佔的國家科委辦公大樓，落實國家科委幹部政策，儘快制訂國家新的科學技術發展規劃。”



鄧小平插話：“國家科委必須馬上恢復，會後就著手解決，事不宜遲。”李自科學院的代表，還就理論聯繫實際、恢復科學刊物出版與國際學術交流等問題發表了許多很好的意見。他們說：“開展基礎學科的研究，這本來是科學院的傳統，但是‘四人幫’掄起‘理論至上’的大棒到處打人，雖然‘四人幫’被粉碎了，但是大家還心有餘悸，希望劃清基礎理論研究與理論脫離實際的界限。”他們還呼籲，對我國科學研究的狀況應當有危機感，由於“四人幫”的破壞，使得本來就落後的我國科學技術，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又拉大了 20 年。如果不切實採取有效措施，這個差距勢必越來越大，其後果是難於料想的。

在談到教育問題時，發言更是踴躍，紛紛列舉大量事實，對“四人幫”破壞教育的罪行進行批判。北京大學周培源先生顯得格外激動，他說：“北京大學是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四人幫’直接指揮聶元梓，通過她搞亂北大，然後再搞亂全國。聶元梓罪惡多端，在北大名聲很臭，但流毒很深，必須要深入揭發批判。”他還說：“北京大學的教授，在文革中沒有受到批鬥的沒有，有的被逼迫致死，有的被摧殘致殘，有的被抄家。現在，應當組織專門班子，認真落實他們的政策，歸還被查的物品，特別是被查抄的書籍、書稿和文物，否則很難打消他們的疑慮，也難以從根本上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清華大學張光鬥先生在談到“劉冰事件”時說：“這是‘四人幫’策劃的陰謀，他們的目的是要迫害包括小平同志在內的一批革命幹部。這一事件受株連的人不少，希望儘快予以平反。”

粉碎“四人幫”以後，高等教育面臨的問題成堆，舊有的規章制度被打破了，新的制度又沒有建立起來，所以人們感到一切都無所適從，大家心急如焚。談論最多的還是如何理解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關於教育的講話，如何對待“四人幫”打著毛澤東教育思想旗號推出的所謂教育改革



歷史性的座談會—策劃恢復統一高考（鄧小平接見會議全體代表，
第3排左1為劉道玉）

措施，不否定吧，那是“四人幫”搞的，要否定吧，那又是在毛澤東名義下搞的，頗有投鼠忌器之慮。例如：上海復旦大學蘇步青提問：“毛主席說‘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對主席的話到底怎麼理解？簡單地說，17年到底是紅線還是黑線？”

鄧小平插話：“17年是紅線，是共產黨領導嘛，怎麼能說是黑線呢！還有一個‘兩個基本估計’，那是‘四人幫’篡改的，要推翻，不然，知識分子頭上的‘緊箍咒’怎麼能解開呢？”

學制要縮短，縮短到多長，三年行不行？與會代表一致認為，三年學制不行，不能保證教育品質，達不到《高教六十條》規定的培養目標。“四人幫”把《高教六十條》說成是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綱領，這是別有用心的。《高教六十條》本來就是針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對高教破壞而制定的，實踐證明，《高教六十條》是完全正確的，應當給它正名二使它在治理整頓高教時重新發揮作用。



在座談會上，代表們還就貫徹毛澤東提出的“五七”指示進行討論，一致認為這是一個關係教育全域的大問題，希望劃清是非界限，否則教學計畫很難落實。此外，對修訂教學計畫、編寫教材和“以典型產品帶動教學”等問題也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議。

會議已進行三天了，來自武漢大學的一位代表一直沒有發言。4日晚上，他找到我說：“會議開了三天了，聽了其他人的發言很受啟發，但是我本打算講的，別人都已講了。你看我講點什麼為好？”我作為會議的工作人員，對會議的進程很關心，通過簡報把會議的內容陸續地報送到中央政治局。出於我的職責，連日以來，我一直在思考“十六字”招生方針，如果不推倒這個方針，大學招生品質就得不到保證，也不能在廣大青少年中造成良好的讀書風尚。於是，我向這位代表建議說：“代表們的確講了很多意見，但是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沒有講，那就是由遲群一夥在北京兩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針。會前，我在天津、順義縣作過調查，廣大群眾一致認為這是一個開後門的方針，強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針，恢復統一高考，而且廣大工農子弟說，他們不怕考。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講這個問題，明確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針。”聽後，他說：“好，這個題目好，我明天就講這個。”

5日上午，武漢大學的這位代表首先發言，看來他是作了認真準備的，發言時情緒有些激動。他說：“大學的招生工作是培養人才的第一個重要環節，它好比農業上的篩選良種。從武漢大學五年招生的情況看，按照‘十六字’方針招收的工農兵大學生，文化基礎相差懸殊，品質沒有保證。所謂的‘十六字’方針，就是‘自願報名，基層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什麼‘十六字’，都是騙人的，實際就是四個字‘領導批准’，其他都是徒有虛名，有的甚至連過場也不走。廣大群眾包括大學裡的教師，對‘十六字’方針非常不滿，他們說：‘解放前上大學靠錢，17年上大學靠分（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現在上大學靠權’，群眾氣憤地

170 說：‘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因此‘十六字’方針不推倒，招生品質得不到保證，‘走後門’不正之風不剎住，黨風不能端正，‘讀書無用’的社會風氣不可能扭轉。”他的發言獲得了成功，不僅使全體代表全神貫注，而且引起了鄧小平的高度重視。他說：“‘十六字’方針必須推倒，恢復統一高考從今年開始。”

劉西堯說：“今年恢復高考來不及了，招生工作會議已開過了。”

鄧小平說：“今年就改，看準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開一次招生會議就是了。”

就這樣，一個阻礙高等教育撥亂反正的攔路虎被剷除了。這次座談是在這場壓軸戲的高潮中勝利結束的，與會代表個個心情舒暢，決心以實際行動參加到撥亂反正的偉大實踐中去。

這次座談會也以豐碩的成果載入史冊！

會後，教育部立即重新召開 1977 年度招生工作會議，組織恢復高考的命題班子。後來，外界只知道恢復了高考，77 級新生推遲到春季入學。究竟是什麼原因？人們並不知道圍繞著推倒“十六字”方針所發生的這個動人故事。實踐證明，恢復統一高考是正確的，特別是在 77、78 級學生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長期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在推倒“十六字”方針之前，上大學他們是沒有份的，是高考給了他們平等的權力，給了他們學習機會。他們果然不負眾望，成為各條戰線上的骨幹。他們當中有不少是我忘年之交的朋友，我總是開玩笑地對他們說：“你們是知青的末班車，但卻趕上了恢復高考的頭班車，是不幸之中的幸運兒。你們是從岩石縫裡蹦出來的一代人才，所以生命力特別強！”





三、北戴河十年來的第一批客人

171

科教座談會的精神傳達後，無論是教育部內或是全國教育戰線上，形勢確實大好，教育界廣大群眾要求加快撥亂反正步伐的呼聲越來越高。於是，教育部黨組於8月6日至8日，召開黨組會議，研究如何貫徹科教座談會會議精神，如何深入廣泛開展教育路線上的撥亂反正。

作為高教司的負責人，我敏銳地預感到，統一高考的恢復，學生的素質將會大大提高，現在面向工農兵大學生的一套做法肯定不能使用了。怎麼辦呢？現在各大學都在觀望，希望教育部拿出意見來。是呀，兵馬未動（大學生尚未進校），糧草先行（教學準備工作），我們必須立即行動，儘快召開一次教學工作座談會，制定有關教學工作的規定。會議怎麼開法？如果會議規模太大，不僅會務工作來不及，而且人數太多，認識難於統一，有可能開成一個“馬拉松”式的會議。於是，我想採用“解剖麻雀”的辦法，召開一個教育部直屬綜合性大學座談會，這類學校既有代表性又是教學改革中的難點。如果會議開好了，那麼其精神不僅工科院校可以效仿，而且地方大學也可以採用，這樣就可以起到以點帶面的作用，推動整個高等學校教學領域裡的治理整頓，使其迅速地走上正軌。

在8月9日的黨組會議上，我把上述想法作了匯報，並建議立即召開教育部直屬綜合性大學（包括兩所師範大學）教學座談會，黨組同意了我的建議，並立即報國務院審批。我要求派一位副部長來領導會議，我協助他做具體工作，但黨組沒有同意，並作出決定：全權委託我領導和主持這個會議。我又建議，與這個座談會召開的同時，採取套會的辦法，召開一個小型的“外國教育研究”座談會。由於“四人幫”的破壞，長期閉關自守，對外國教育完全不瞭解，現在治理整頓，有必要研究和借鑒發達國家辦大學的經驗。黨組認為建議很好，也同意套開這個小型會議。

172 10日上午，國務院批覆同意召開“教育部直屬綜合性大學教學座談會”，會議地點定在北戴河，全部會務工作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承辦。我很欣慰，這真是特事特辦啦，會議雖小，規格卻很高，意義非同尋常，一定要把會議開好！

當天晚上，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劉處長率領醫務人員、炊事人員、服務人員以及高教司的工作人員和新聞記者 20 多人，乘一輛大交通車，星夜趕到位於北戴河的國務院第一招待所。

這個招待所位於北戴河風景區的中段偏東一點，離海邊 500 米左右。它的左右兩側是有關部委的招待所和療養院。北戴河風景區地處河北省秦皇島市，東起鴿子窩，西到北戴河口，南臨渤海，北依蓮蓬山。境內林木茂密，鮮花盛開，海水湛藍，氣候宜人，是著名的避暑盛地。

但是，自文化大革命開始，這裡被作為養尊處優的修正主義的溫床而查封，整整十年了，這裡竟沒有一個人來住過。我們是啟封者，是十年來的第一批客人。我們到達時，已是深更半夜，是夜，大家將就住了一宿。是海潮聲把我們驚醒的，當太陽還未從海面上升起的時候，我們早早地起來了。由於興奮，大家都沒有睡好，這一點從他們的惺忪睡眼可以明顯地看出來。但是，面對年久失修的招待所，我們不得不自己動手，打掃塵埃，清理雜亂堆積的傢俱，洗刷廚具，牽掛窗簾……經過一天的忙碌，一切準備就緒了，這個招待所又以新的面貌出現在我們面前。

從 11 日晚到 12 日，是與會代表報到時間。按照通知要求，參加綜合大學教學座談會的有北京大學等 13 所學校，每校代表 2 人，其中學校負責人 1 人，教務處負責人 1 人，共計 26 人。參加外國教育研究座談會的 4 所學校是：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以研究蘇東歐教育見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側重於歐美國家教育的研究；東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研究室和河北大學教育科學研究室，



參加北戴河會議的部分代表（後排右3為劉道玉）

他們重點研究日本教育。這4所學校每校代表2人，共8人。另外還有兩名記者參加，他們是新華社的楊廣惠和《人民日報》的莊永齡，加上教育部的4個工作人員，總共40個人。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小型座談會，堪為召開解決實際問題的高效率會議帶了一個好頭。

會議於12日正式開始。首先，作為會議的主持者，我傳達了8月2日鄧小平召開科教座談會會議的精神，講了這次會議的目的要求和開法。我說：“會議的目的是在全面、正確地學習和理解毛澤東教育思想的基礎上，批判‘四人幫’及其一夥對高等教育的破壞，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劃清是非界線，制訂出適合於恢復高考以後的教學大綱。會議分為兩段，採用虛實結合，所謂虛，就是學習和準確地理解毛澤東對教育的若干講話，統一思想認識；所謂實，就是實事求是地訂出實用的、符合教育規律的教學大綱。為了開好會議，必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敢於創新。過去開會，總是找領導要精神，要上面拿文件，這次會議我們要打破這個框框，精神靠大家討論提出，檔由與會代表來起草。因此，每位代表既是參加者也是主持者，既是客人也是主人，我只是作為召集人，起組織聯絡作用。最後，會議的成果是要形成一份對今後教學工作具有普遍指導作用的《會議紀要》，經過反覆討論修改，直至滿意為止。”（未完待續）……